

北美華人基督教學會會訊

第41期

2004年6月30日

- 中國學術之行 1
- 中國之行有感 2
- 簡訊 3
- 讀書研討會報導
宗教比較與文化理解 4
- 讀書研討會報導
自由公共知識分子中的“聖徒”與“神學家” 5
- 國際會議綜述
基督教與當代中國 6



主編 王忠欣
執行編輯 夏訓智

144 Hancock Street,
Auburndale, MA 02466
USA

Tel/ Fax: (781) 862-3964
E-mail: ccsana@juno.com
www.ccsana.org

中國學術之行

2004年4月，北美華人基督教學會會長王忠欣博士、學會董事汪傳生先生、及費城西敏寺神學院威廉·埃德加教授夫婦一行，赴中國進行了為期近一個月的學術交流。這次學術交流共去了9座城市，訪問了14所大學及社科院，所到之處，受到各相關學術單位的友好接待。

在北京期間，王忠欣博士在北京師範大學與師生們座談了宗教文化與社會發展。他指出，世界上的重要文化幾乎都是宗教，西方的文化是以基督教為代表，阿拉伯文化以伊斯蘭教為主，中國的傳統文化是儒釋道，撇開儒家不論，佛、道均為宗教。故此，不研究宗教就不懂得文化，對中國文化也是如此。人類社會的發展就是在宗教文化的作用下進行的。宗教文化與社會發展之間的關係非常複雜，不可能用單一的模式來概括。過去，中國對宗教負面的作用講的過多，對其積極的一面認識的不夠，這是目前需要加強研究的。王忠欣博士還在江西師範大學和華南師範大學，作了三場題為“基督教與中國近現代



教育”的學術講座，以講故事的方式，向師生們介紹了基督教對中國教育發展的貢獻。

埃德加教授這次作為學會的嘉賓參與了學會的學術交流。他在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和中國人民大學作了題為“以歐洲為鑒：中國在變化世界中的未來”的學術講座。他提出中國在向西方學習的過程中要避免兩個極端，一是全面否定西方文化，二是全盤接受西方文化，正確的態度應是批判性地吸取歐洲文化中營養成份。他特別指出，歐洲在世俗化的過程中對其核心價值基督教的過分否定應引起中國學者的注意。歐洲的現代化進程，由於失去了信仰體系的支撐，許多方面出現畸形發展，這是中國需要從中汲取的教訓。在山東大學、復旦大學、和安徽社會科學院，埃德加教授做了相同題目的三場學術講座。此外，他還以“美國的宗教、文化與社會”為題，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和安徽農業大學作了兩場學術報告，受到師生們的歡迎。



在這次中國學術交流活動期間，王忠欣博士一行還拜訪了浙江大學、中山大學、雲南社會科學院、華中師範大學、中華文化交流與合作促進會等學術單位，就彼此間的學術交流和合作交換了意見，並就近期聯合舉辦學術會議、翻譯、研究等方面的專案達成了初步的協定。



此外，王忠欣博士還將學會近期的出版物《基督教與中國：傳教士文化》和《基督教與中國》年刊第一輯，贈送給所訪問的各個大學和社科院。學會在推動基督教研究方面的學術成果受到各學術單位的高等評價。

中國之行有感

——威廉·埃德加(William Edgar)

“作為一位渴望創新的現代中國畫家，他必須開拓一種全新風格的畫，這種風格不僅在東西方都是從未有過的，在中國也是別具一格的。”劉國松這番具有挑戰性的話表達了當今許多中國人的一種情感：人們想在各個方面進入現代，但是如果要保持中國的味道，一味模仿西方是沒有出路的。

我和妻子巴巴拉剛剛結束了在中國為期三周的學術之行。這次學術之行的主辦單位是北美華人基督教學會，會長王忠欣博士和學會董事汪傳生先生帶領我們圓滿完成這次學術交流。我們停留的時間雖然短暫，卻使我們感到謙卑和興奮，終身難忘。

每一位初到中國的遊人都會有許多相同的印象和感受：高樓林立；自行車、汽車和公共汽車爭道；友善的民眾；熙熙攘攘卻總是有序可循的人群；勤奮刻苦；端飯碗，用筷子往嘴裏扒飯；一家只一個孩子；美麗的古宮殿；對美國強烈的好奇心；非常舒適的火車和飛機；傳統戲劇；科學和知識的快速發展等等。

這次中國之行的目的有三：首先，我們去學習。當然，在這樣短暫的時間裏吸收中國博大精深的文化是不可能的，然而畢竟有了一個良好的開端。其次，我被邀請到七所大學和社科院作學術演講，內容為：“以歐洲為鑒：中國在變化世界中的未來”和“美國文化介紹”。這些講座旨在探討基督教在西方世界扮演的角色，一方面肯定基督教的貢獻，另一方面也批判基督教價值觀被世俗化以後所產生的錯誤方向。第三是充當外交家。這出乎我的預料，但也令人興奮。在旅程中，我被多次問及美國的對外政策和環境問題，幸好在此之前我曾仔細思考過。很多時候我的看法與美國政府相反，因此我的立場也代表這樣一種理念，即我們的政府是一個“人民”決定的政府。

我們在各地都受到了友好的歡迎，以下是一些片段。

北京：結識了波士頓學院的吳秀良教授，他是研究中國教會復興史的世界級專家；在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和中國人民大學作了學術報告，和師生們探討相關問題；參觀了故宮、頤和園，還乘三輪車遊覽了老北京城，包括了毛澤東住過的學生宿舍。

山東濟南市：在山東大學哲學和宗教系作學術講座；從事猶太教研究的傅有德教授負責接待；同專門研究老子的姜生教授探討道教；遊覽了孔子的故鄉曲阜；攀登了泰山，那裏的孩子喜歡和“老外”合影；復活節的早晨，我們到教會禮拜，居然聽到

了用漢語演唱的亨德爾的聖歌；教會的牧師見到我們非常高興。

上海：高樓大廈的海洋！在復旦大學作了學術報告，有一位年輕學生極其仰慕Cornelius Van Til——西敏寺神學院的護教學前輩校友；在我的演講中，政教分離的觀點引到了特別的關注；在外灘散步，參觀城隍廟。

杭州：遊覽了這座號稱“天堂”的古城；西湖非常美麗；喜歡那裏的藝術學校和美術展覽。

合肥：乘坐夜間火車一路北上；這座城市裏有中國最好的科技大學；在科大的人文學院作關於美國社會與文化的學術講座；參觀了“包公祠”；在安徽農業大學作了同樣的講座，受到300多名學生的歡迎。

廣州：接待我們的是當地大學的教授，簡短的寒暄談話之後，他們把我們送上了開往香港的火車，這次只有我們自己了。

香港：和我的老同學周永健聚會，他是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的院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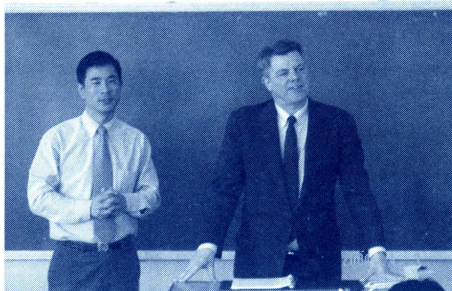
簡短的篇幅實在難以表達此行的深切感受。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高行健在《靈山》中，敘述有一次他遇到一位婦女，她說“她不知道什麼是幸福，但她已經有了她該擁有的一切：丈夫、兒子，人們所公認的完美家庭。”這難道不是後毛澤東時代人們矛盾心理的最好

描述嗎？儘管社會在進步，生活不斷改善，但是人們仍然感到空虛。這種空虛是人們對未來的希望沒有多少把握。我們看到一個電視節目宣稱，中國未來的社會有四種發展趨勢：農村將變為城鎮，居民將成為公民，無產者將成為有產者，鄰居將成為陌生人。

中國仍在尋求意義。中國人總的來說傾向於“實用主義”。這可追溯到孔子和老子的教導。這兩大思想流派對於是否有上帝的問題，都採不可知論，儘管他們都渴望得到答案。這兩大思想流派都講究實用。孔子說：“仁者樂山，智者樂水”。意思就是說，如果你善良無邪，你就是那種欣賞自然風光的簡樸和美麗的人；但是如果你有智慧，你就知道如何引導不斷變化的生命之水的走向。孔子曾經說過，朝聞道，夕死可矣。但是在缺乏對道的認知的時候，人們必須找到生活的準則。在中國既沒有伊斯

蘭教的宿命論，也沒有歐洲共同體式的純粹經濟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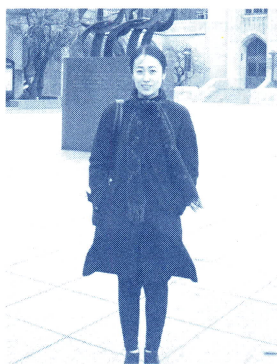
中國深思的傳統仍然處處可見。爬上泰山的時候，我們認識到中國文化與松樹、河流和山川等大自然的緊密



簡訊

※

由學會與美國波士頓大學合作開設的訪問學者節目，於2003年7月正式開始。這一節目的第一位學者為清華大學哲學系的田薇教授。她將在波士頓大學進行為期一年的研究，準備“基督教倫理學”的課程。訪問學者節目的宗旨，是為中國高校中從事宗教學教學研究的學者，提供一個在美國學術機構進修、研究基督教的機會，特別是為在學校中開設的有關新課作準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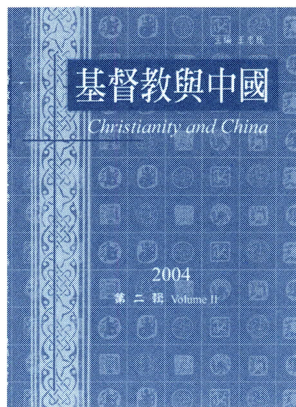


※

2004年1月3日至9日，王忠欣博士在美國加州基督工人神學院，為該校學生講授《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密集課程。3月20日至28日，王忠欣博士應邀在加州豐收神學院，為該校學生講授《基督教在華史》密集課程。

※

由王忠欣博士主編的學會年度學術刊物《基督教與中國》第一輯（2003年），已由美國恩福基金會出版。《基督教與中國》的創刊，標誌著華人學術界有了一本專門討論基督教與中國的定期學術刊物。《基督教與中國》的內容將以學會年度學術大會的論文為主，同時也接受世界各地學者們的來稿。



※

由學會與清華大學合作翻譯、王忠欣博士任主編的“北美宗教文化專集”，已由中央編譯出版社在北京正式出版發行。這套專集共有四本書，被列入“清華哲學翻譯系列”。2004年上半年出版的兩本書分別為：阿利斯特·麥格拉斯（Alister McGrath）的《福音派與基督教的未來》和喬治·馬斯登（George Marsden）的《認識美國基要派與福音派》。



※

在2004年6月學會主辦的“基督教與當代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四川大學歷史系主任陳廷湘教授代表該校，聘請王忠欣博士為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客座教授，並在會上向王忠欣博士頒發了聘書。



聯繫。是的，如果中國只是盲目地效仿西方，那將是多麼的可悲。實際上，歐洲的發展也帶來許多問題，他們也在這些矛盾中掙紮。法國哲學家Luc Ferry寫了一本暢銷書，《如何使你的生命更豐盛》。作者渴望超越狹隘的解釋學的哲學，或者只以經濟利益為驅動力的追求。中國之行使我進一步確信：東西方都在尋求意義。

我們都認為，這次由北美華人基督教學會舉辦的學術之行達到了我們的目的，這樣的活動應該更多地進行。中

國人會因著西方學者對他們著名學府的訪問而受益，而西方學者也會從中國學者身上學到偉大的傳統和傑出的學問。在積極準備2008年的奧運會和2010的世界博覽會的同時，中國還在努力尋找自己的身份認同。正如劉國松所說的：“作為一位渴望真實的現代中國人，他必須相信一種新的世界觀，這種世界觀還沒有用中文表述過。這種世界觀存在於中國的獨特實踐中，並與基督教信仰的普世內涵相聯繫。”

宗教比較與文化理解

2004年3月6日，北美華人基督教學會在馬薩諸塞州烏斯特市舉行了美東地區2004年的第一場讀書研討會。主講人是波士頓大學神學院院長南樂山（Robert Neville）教授，題目為“宗教比較與文化理解”。南教授是美國著名的哲學家、神學家和宗教學家，也是波士頓儒家學派的主要代表。來自哈佛大學、波士頓大學、哥頓康威爾神學院等院校的華人學者20多人參加了這次讀書會。以下是南樂山教授演講的主要內容：

當今的世界處在歷史的嚴峻時刻，充滿了許多潛在的衝突，不同文化之間的相互理解就變得特別重要。要建立一個文化間彼此理解的共同基礎，需要付出特別的努力。去學習一種文化的核心典籍或主要內容，並非一件難事，但在理解別人的文化時，我們卻總是帶著自己的解釋學的觀點。所以，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學會如何糾正自己最開始所帶有的觀點的偏見。

在波士頓大學，過去四年我們主持了一項比較神學研究的課題。參加這個課題的有精通六大不同宗教傳統的專家學者。這些學者對於比較研究中得出的任何判斷都非常謹慎。此外，我們還有四位學者專門進行比較和整合。他們是：宗教社會學家彼得·伯格、神學院副院長約翰·白詩朗（他也是一位宗教歷史學家，專攻中國宗教）和衛斯理·魏德邁（他的強項在西方宗教和神學）。第四位就是我自己，我最基本的訓練是哲學。

我們的研究集中在三個主題上：第一是人的地位（人性）；第二是終極實體；第三是宗教的真理。這些主題被我們稱為模糊範疇。這些模糊的範疇可能在被各種其他宗教理論解釋時顯出其特別之處，而這些宗教理論之間也許是相互矛盾的。如：人性的主題在中國宗教中有特別之處。南亞的宗教在區分幻覺和真正的實在方面非常特別。西亞的宗教，即基督教、猶太教和伊斯蘭教則專注於義的問題。在做比較時，第一個原則就是要保證被比較的範疇是中立的，對所有進行比較的對象都予以尊重，不帶有偏見。做到這一點的唯一方法就是去深入研究將被比較的不同理論。

在研究中，我們組織了許多小型研討會。六位從事具體研究的歷史專家就每一個宗教傳統撰寫一篇文章，並在當年秋季把文章提交上來。然後，我們討論這些文章，作者根據大家討論的意見重新改寫，並在下一年的春季提交上來進行比較。如果課題組所有成員都認為錯了，我們將在第二輪的研討會中重新比較。

所以在研究中，有兩點是隨時準備調整的。一是模糊的範疇，我們要保證對這些模糊的範疇沒有偏見。二是保證被歸入某一範疇的內容沒被曲解。例如，人性（人的地位）的範疇源自西方基督教，但是人們很容易將之廣義化，你會說道德經或其他宗教經典在人性上也說了什麼。

以猶太教為例，猶太教幾乎在人性方面沒有任何論述，只是講到成為猶太人意味著什麼。這樣，我們就知道了，根據人性的範疇去比較就意味著我們就會忽視猶太教認為是重要的東西。

我們在比較研究終極實體時有過相同的經歷。終極實體這種語言對基督徒來說，非常易懂，對相信“道”的人，和相信“梵”的人也不困難。佛教，特別是大乘佛教否認任何實體的存在。在大乘佛教中，所謂終極並不是說任何事情都是真實的，而是對擺脫苦難的追求。所以，我們必須區分兩種終極實體：本體論的終極實體和人類學的終極實體。在進行比較時，最困難的事情之一就是，當你使用比較範疇的語言表述你要比較的兩個東西，或更多東西時，你很可能已經對你要比較的東西有偏見了。

所以在比較中，我們將觀察各宗教的立場，並與他本身如何看世界進行比較。我們也要問其他的宗教如何看待此宗教。同時，我們也想說，我們所使用的語言無法表達被比較的宗教的細微差別。

未來在比較的範疇和重新表述被比較的事物方面，我們會繼續提出關於比較的假設，並且這些假設也會被不斷更正。進行這項比較研究的第一年是非常困難的，尤其是在感情上，因為每個人都認為他們的傳統沒有被理解。然而，第一年過去后，課題組的每個人都對其他的宗教傳統開始有了更多的理解，最初較為粗糙的比較也得到了更正。

這一研究已經進行了四年，完成了三卷書，但這只是比較的開始。我們所做的工作都是一些非常原始性的，試圖開發出一套所有文化、學術界都接受的

範疇。我們需要至少50年的時間去建立一種能夠超越文化的詞彙。這一研究關注的主要是非常抽象的宗教思想，而不是宗教實踐及其社會處境。

這種被精心設限的比較分析需要真正的交流來補充，這種真正的交流就如你們來到西方，或者我到中國去看見真正的處境。另一個複雜的事實是，我們所學習的許多古老經典如道德經，或論語，所面對的環境，不同於當代世界的環境。我們的這項研究僅僅是開啟了一扇進行深入而豐富的比較研究的門。我認為在進行這些應當特別注意的比較研究時，對我們來說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我們能夠寬容我們所研究的思想。

我不是中國人，但我學過許多亞洲的儒家經典。就象我不需成為希臘人而可以成為一名柏拉圖主義者一樣，我也可以不需成為一名中國人而成為一名儒者。對我來說，儒者意味著深深的接受許多古代儒家的思想，特別是荀子的禮的思想，並把禮的思想運用到現代環境中去。我認為禮的理論所表達的整個中國傳統，都能被連接到西方有關符號性質的討論中。西方對符號的興趣源自試圖避開康德死胡同的哲學運動。西方在對待符號論態度上的巨大失敗是因為它沒有與道德、倫理、或價值理論相聯系，而中國儒家禮的概念是深深地植根於道德中，或是與對生活的恭敬態度密切相連。



讀書研討會報導

自由公共知識分子中的

“聖徒”與“神學家”

北美華人基督教學會美東地區2004年春季讀書研討會，於5月22日在新罕布什爾州糖山鎮舉行。這次讀書研討會的主題為“自由公共知識分子中的聖徒與神學家”，主講人為哈佛大學訪問學者、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秦暉。



秦教授主要從事經濟—社會史、農民問題、改革與現代化問題研究，著作甚丰。來自波士頓地區的近20位學者參加了這次研討活動，以下為秦教授的發言：

一位朋友几年前曾寫道，專制主義有

時依賴於人們的狂熱，但絕大多數時候是依賴於人們的冷漠。人們的冷漠有時是因為無知，但絕大多數時候是因為恐懼和自私；專制主義的建立也許需要原教旨主義，但專制主義的維持，通常只需要極其世俗的犬儒主義。專制主義建立它的集中控制時需要臣民的“集體主義”，但維持這種控制時更需要臣民的“原子化”，需要他們“黃牛過河各顧各”。古代帝王所以懂得“法道互補”，商君韓非之流所以通過分異令、推行瓦解族群自治的偽個人主義來實現“利出一孔”的國家經濟統制。

在自由秩序中做自由主義者，低調律人，亦低調律己可也。唯獨在非自由狀態下做自由主義者，高調律己、低調律人恐怕是必具的品格。無論古今中外，低調律己、高調律人的暴君與偽善者都不乏其人，而低調律己、低調律人的“嬉皮士自由派”與高調律己、高調律人的英雄也不難找。但是，高調律己、低調律人的人的確是少而又少。

一些宗教中的聖徒具有這樣的品格：為了拯救眾生，他們基於信仰而願意戴荊棘冠、釘十字架、上火刑柱，但他們並不要求別人也這樣做，不要求別人與自己一樣付出代價，也不要求他們回報自己的付出，甚至對別人的不理解、別人的敵對也以德報怨，正如胡斯對那位往自己火刑柱上添柴的“虔誠老婦”。在逆境中聖徒勇於捨身殉道，但是在得勢時他們通常並不以勢壓人——儘管在並不時與宗教寬容的中世紀，有些被教廷封聖者捲入過宗教審判，但總的說來當時最嚴酷的那些宗教審判官如托爾克維馬達皆未得封聖。而像托馬斯·莫爾那樣的聖徒自己堅持信仰，受害於宗教迫害而殉道，但在他自己掌權時對待“異端”按當時的標準卻是非常寬容的。

聖徒並非神學家，儘管基督教歷史上有些神學家如奧古斯丁、阿奎那等也曾封聖，但絕大多數聖徒並沒有神學著述甚至有的干脆目不識丁，在宗教理論上談不到什麼原創性發明。他們主要不是信仰的論證者，而是

信仰的實踐者。但在基督教歷史上聖徒的貢獻決不亞於神學家，而聖徒之難得則遠過於神學家。沒有一種辦法能夠成批“培養”聖徒，但中世紀的經院制度曾系統地培養了大批高造詣的神學家（所謂經院哲學家）。他們無疑是有貢獻的，過去某種意識形態對“經院哲學”的全盤否定是不對的。但是毋庸置疑，當時神學家的眾多並沒有改變宗教暮氣沉沉、教會腐敗不堪的危機局面。後來的宗教復興恰恰是從恢復早期聖徒傳統開始的。新教方面固然強調“因信稱義”，天主教方面的人文主義者也強調“樸素的虔誠”。被認為是近代自由制度創造者的新教徒，尤其是清教徒有許多遠遠超出“消極自由”的高調追求。

如果說作為一種具體信仰的基督教不能沒有神學論證，但作為運動的基督教更依賴聖徒的實踐，那麼超越於具體信仰之上，對於“多元化、信仰自由、宗教寬容、諸教平等”的信念可以說是一種“元信仰”，如前所說，這種“元信仰”之難不在於論證而在於實踐。因此自由主義當然不能說不需要自己的“神學家”，但更需要“聖徒”，它的這后一種需要超過任何具體的宗教信仰。這裡所指的聖徒無非是具有某種品格的人，這種品格說到底，無非一是拒絕專橫，二是寬容待世。

不言而喻，自由主義本身並不是宗教，但在歷史上自由秩序的實現過程的確與宗教有關。馬克斯·韋伯論證過“新教倫理”對“資本主義”的關鍵作用，一些學者如施密特等人反駁說不僅新教，天主教倫理也可以促進近代社會的產生。其實，歷史上所謂的英國革命形式上就是一場宗教戰爭。支持國會抗擊王軍的那些英國農民很難說是基於什麼物質上的“階級利益”，而就是基於新教徒的宗教熱誠來投入這場變革的。沒有這樣一種超越世俗利益的精神動力，就很難跳出“三個和尚無自由”的困境。近代自由秩序所以在英國出現，與新教的某些具體教義未見得有韋伯強調的那種必然聯系。但它的確與某種超越性的宗教精神有關。

自由主義作為一種制度安排無疑是世俗的，自由主義的宗教觀則必然是多元的，它不可能僅僅與某一種宗教、某一種文化相聯系，更不可能對其他宗教其他文化持排斥態度。自由主義與任何形式的宗教審判都不相容。但是自由主義者完全可能是異端迫害的火刑柱上的殉教聖徒，自由主義這種世俗制度的建立需要某種宗教精神或曰終極關懷的土壤。

中國不是基督教國家，但是中國文化如果仍然富於生命力，它必然有自己的超越性與終極關懷資源。這種資源可以用“窮則兼濟天下，達則獨善其身”來描述。這也可以說是中國式的聖徒精神：窮則兼濟天下，為無權者之權利，知其不可而為之；達則獨善其身，以有德者之德行，己所不欲勿施人。

總之，以高尚持身，己雖達而知權力之限；為“庸眾”而爭，境固窮而唯權利是守。此謂之聖徒。方今天下，求一己之“自由”者多；自古域中，馭八荒之英雄者眾。而聖徒不世出。無聖徒而自由難成秩序，主義或為談資；英雄演為屠夫，內痞滋生外霸。有聖徒者，其為慎公乎。



基督教與當代中國

2004年6月11日至14日，北美華人基督教學會主辦的第九屆“基督教與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在美國紐約市附近環境優美靜謐的宣道會神學院舉行。正值那幾日天氣涼爽宜人，但研討大會的氣氛卻是熱烈活潑，學者們都投入到嚴謹的學術討論中。

此屆會議的主題是“基督教與當代中國”。參加會議的學者有近七十人，主要為在北美學習的學者；另外，十多位學者特別從中國大陸、香港、臺灣和英國前來參加。會議收到學術論文近四十篇，各種角度和不同層面的介紹使眾與會者大得飽足。

11日晚開幕式上，宣道會神學院院長施羅得爾博士（Dr. Schroeder）在開幕式上談“二十一世紀對中國基督教高等教育產生影響的因素”。他認為西方不是東方效仿的最佳榜樣。基督信仰出於東方非西方，他中肯地指出中國在避免西方教會的錯誤上的優勢。基督教高等教育不應主要地為著實際的傳福音的目的，而應注重其潛在的對社會產生的影響力，為影響文化大環境的各行各業培養出具有全面基督教世界觀的優秀公民和專業人士。

北美華人基督教學會會長王忠欣博士給大會致開幕詞，就主題進行了簡要的介紹。他說，自1980年代中國社會的改革開放以來，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在全球引起世人的關注。基督教在中國的存在形式多樣，但“學術界的基督教研究是基督教作為一種思想在中國存在的主要方式。”基督教在中國社會中的影響還處於弱勢，但學術界的基督教研究對中國社會可以產生一定的影響。

接下來作學術發言是波士頓學院歷史系吳秀良教授，和北京師範大學哲學系教授劉孝廷教授。吳教授在題為“當前中國基督教的現況和前瞻”的發言中，不僅對“基督教兩會”作了精闢的介紹，對家庭教會“合法”和“非法”問題，圍繞中國政府“十九號文件”作了全面分析，而且還針對地方上執行法規中發生的問題進行了探討。最後，吳教授建議以溫州教會作各地家庭教會的參考，既合法又不違犯信仰；同時建議地方執法機構與教會領袖溝通，消除思想上的疑懼。

劉孝廷教授的論文“認同的他者——當代中國文化架構中的基督教”，首先對中國文化架構中的“一體兩翼三足五元”作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概括，然後側重分析了基督教作為文化認同的他者在當今中國文化整體中的位置：一方面基督教在“五元”系統是根底最不牢靠者，另一方面，基督教發展速度快，大有反客為主的架勢。中國社會對其態度也是多種多樣：一是出於對傳統文化的虔誠而生

的文化憂慮，二是有西化意識或傾向人士的樂觀態度，三是出自於馬克思主義者的文化拒斥。但當前中國社會需要一種宗教情結，而基督教因其“精神化追求和宗教思維的‘啟發’作用，很可能有助於歸併中國人的宗教情結，將其序化，形成系統的精神理念。”

十二日上午，大會開始進入研討階段，三十多位學者宣讀了研究心得，進行了切磋交流。

基督教與中國社會

基督教對今日中國社會可能作出的貢獻，是許多學者關注的焦點。臺灣基督教與中國研究中心研究員李錦綸博士宣讀論文“中國的都市化與基督教”。他指出，都市化是中國的現實問題，也是現代世界的主要方向。都市化的社會失去舊有的土地與人的關係之後應以人與人之間的友誼來替代。友誼有許多聖經根據，比如耶穌與門徒的關係。解決都市化帶來的無根化問題，可以在基督教信仰那裏找到答案。友誼是屬靈的委身，是都市化帶來的失根性和心靈空虛之問題的解決途徑。

香港道風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員陳家富博士在“基督宗教的生態論述與當代中國環境問題”一文中，論述了莫爾特曼、麥菲和科布三位神學家如何處理生態學和經濟學問題。基督教生態經濟學注重個人在社群中的位置和需要，以整全、循環的思圪代替原子式的、直線發展思考模式。

在“基督教與當代中國的社會公正”一文中，哈爾濱工業大學季國清教授分析介紹了中國當前改革狀況，提出基督教的個人主義原則所形成的新的所有權模式，即在神面前人人平等，使維持中國社會安定成為可能；他指出應對基督教寬容，讓基督教走入民間。

美國三一國際大學博士候選人徐明富，在“政教分離與基督教救國論”中指出一種偏差：即基督教旨在救人不在救國，基督教沒有改變社會的可能。理解強調基督教的功能過於其本質。與之相反，徐明富認為教會與文化要保持一定的距離，信徒成為社會的先知和預言者。教會不是主流才能批判社會；基督徒要做先知而不是君王。

畢業於洛杉磯國際神學院的彭強討論的問題是“基督教與學術自由”。他認為基督教與學術自由非但不是對立的，反而是其土壤和動力。學術自由是有聖經依據的。歷史的考察也證明基督教給學術自由開闢的空間。基督教對現代中國學術自由的現實意義包括學術自由的獨立人格問題、學術自由的界限問題等等。

基督教在當代中國

基督教在當代中國的發展是與會者關注的另一個話題。臺灣基督教與中國研究中心研究員陳韻珊博士向大會



提交論文“基督教在中國發展的新趨勢”，討論了中國的宗教政策，以及公開教會與家庭教會日漸增多的聯繫，並介紹目前的神學教育以及教會事工的多元化發展現狀。

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石衡潭博士探討了“中國家庭教會反智傾向與個人化傾向”。家庭教會反智傾向表現在：信仰上的獨斷、對三自的排斥、組織上的不民主、對世界排斥的態度，以及在對中國文化的輕視。他分析其歷史形成原因，追溯到歐、美的虔誠派的影響。這局勢的行成還和它不能在社會上公開及經濟地位不足有關，但反智傾帶來的後果不容低估。

北京珠市口教會主任牧師李永紅通過自己成為基督徒的經歷，向與會者介紹了中國普通民眾認信基督教的过程；而她讀神學及在教會服事的歷程，也幫助大家瞭解了中國牧者成長的經過，以及所面對的困難和挑戰。

華南師範大學歷史系的何慧教授在廣東省五所大學發放問卷，就有關信仰、宗教、基督教作抽樣調查。當代中國大學生對宗教信仰既理性、寬容，也困惑、迷茫。多數學生願意瞭解基督教，並且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並不排斥基督教，他們也認識到宗教是一種文化，是社會上的客觀存在，其合法地位得到國家保護是體制健全的標誌。

中國社科院人類學研究所黃劍波博士的發言“國家的在場與基督教的回應策略”，介紹他在中國一個村莊所作有關基督教信仰的調查研究。他指出，基督徒在現實社會中所採用的種種應對策略，顯示他們一方面明智地選擇了向國家力量示好方式，另一方面也在心靈深處本著對上帝的信仰而與一切世俗政權和意識形態保持距離。

南京師範大學徐颯教授的“中國基督教教堂建築的歷史與現狀”，展示大量教堂建築的圖片，介紹中國基督教教堂建築迄止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兩種基本風格：模仿西方教堂的西方樣式和模仿中國傳統建築的民族樣式。前者傳達外來宗教的公開形象，後者體現了扭轉基督教的外來形象和探索本色化做出的嘗試。八十年代以後的教堂建築也主要有兩種形態，一種表現出現代世俗建築樣式與西方教堂傳統符號的疊加，另一種體現出對新的建築形式的探索，二者均缺乏宗教經驗的有效介入。

基督教與中國文化

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互動一直是學者們思索最多的問題。旅居洛杉磯的自由作家劉前敏在“福音中國化的體用合一觀”中指出，福音可以啟示中華文化，中華文化可以闡釋福音。中國文化是聖人的文化，因此中國人也是耶穌的選民。他比較中國文化和福音真理，認為應以福音為本始，中華文化為承行，使他們相互融合。

加拿大中國學院院長陳慰中博士談“一位西方人看中國文化”，介紹了劍橋大學院長李瑟約（1900—1995）

的看法。他認為中國不如西方發達，原因在社會制度。仕、農、工、商，商在最後，而在西方商在最前。中庸可以與基督教結合，產生信心與行為的均衡結合。

洛杉磯國際神學院謝文郁教授的“從義利之辨看因信稱義”，從儒家對“義”的闡釋出發，對“因信稱義”進行語言分析，說明不同語言的使用會導致不同的神學走向。一方面，我們不能強求統一不同文化中的神學，但又必須從信仰角度對語言和文化表達進行深入的分析和嚴格的檢討，對它們在基督信仰中的滲透有清醒的意識，從而避免把我們信仰中的語言和文化導向當作信仰來固執。

旅居紐約的自由作家謝選駿的“三談ABC神學——西學中源說的幽靈再現”，列舉了“西學中源”說的實例，提醒基督徒防備那種用基督教語言傳播華人的生活、風俗、習慣、傳統行為模式或價值觀的現象。

美國恩福基金會會長陳宗清博士在會上的發言題為“宗教多元主義與基督教”，討論了啟示與文化的關係。人與神之間存在著沒有辦法越過的鴻溝，但神的真理又同時有延續性。文化不是絕對屬世的，不能負面地看世界。

在所有文化中，我們都可以發現上帝透過一般啟示給人智慧與真理，但啟示的高峰卻是耶穌基督。

克萊蒙特研究大學博士候選人倪慧良提交的論文是“從世界基督教的发展看中國基督教的趨勢”。他認為中國基督教會有自己的特徵，也有全球性的特徵。他同時預言基督教的多元化不可避免，在神學上可能會出現具有中國特色的教會論，救恩論和成聖論。

宣道會神學院研究員劉同蘇的發言是“文化更新與超越淵源”。他認為，在湯因比的理論中，宗教是文化維繫自我生命並回應外部挑戰的根本淵源，而基督教是一切終極性超越淵源中的最佳候選，表現在基督生命中的三個本質要素上：“道成肉身”、“十字架”和“復活”。

香港建道神學院的梁家麟教授介紹了“趙紫宸早期的基督教思想”。趙紫宸是二十世紀華人基督教會最重要的神學家之一。梁教授通過他的《基督教哲學》一書，評述了二十世紀上半葉華人自由主義信徒的信仰取捨與難局，探討了趙紫宸在本色化名義下所做的基督信仰再詮釋。

華南師範大學江雪蓮教授的發言題目為“儒家修養論與基督教修行論比較研究”。她主要討論了兩者之間的相同之處，如修養與修行都是人格的一種自我超越；二者皆為力圖拋棄意識的虛假性而追求事物的本真狀態的努力；強調理性、感情、欲望的和諧統一；以及強調修養是一個由低級或較低境界向高級或較高境界發展的過程等。

清華大學哲學系田薇教授在會上的發言為“從拯救觀念看基督教和儒家思想的資源互補”。她指出二者的差異不只是對同樣的問題具有不同的理解，而且更重要的是由於它們具有不同的問題意識。基督教的拯救觀是神力神



救，而儒家的拯救思想是自力自救，基督教強調人性的不足，儒家思想注重人性的自足。這兩種文化資源進行對話、交流時，其實質不在於融合，而在於互補。

廣州社科院葉蓬博士對儒家與基督教的“應當”之觀念進行了比較。“應當”概念無論在漢語還是西方語言都是從特定的語義發展出共同的意義，而且儒家與基督教的“應當”基礎既是內在於人類生活或人類本性的規律或“道”，又有絕對性、確定性和超越性的本體。前者以人、行為主體為倫理哲學的中心，而後者以行為價值為倫理哲學的中心，前者著眼點在於人之所是，而後者的著眼點在於對倫理價值的實證的邏輯與語言分析。

四川石油技術學院的王定雲教授討論了“愛人如己”。基督教的最偉大的誡命之一就是要愛人如己。一旦真理完全進入了真心中，我們就會時時處處在言談中、行為上、思維裏不聲不響地體現出愛人如己的真理來。

《天上人間：末世、千禧年及烏托邦的追尋》是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楊慶堃教授在會上的發言。他指出中國人一直追求烏托邦的理想。儒家的烏托邦是現實困苦生活的反面或控訴。宗教的烏托邦如太平天國和毛澤東發起的文化大革命，是受外來影響，太平天國來自基督教，共產主義來自馬克思。它們與基督教的千禧國度不同。千禧國度不是人力所成就，是超自然力對現世的拯救。

基督教在華史研究

與會者中歷史學者自然關注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歷史。普林斯頓大學博士候選人陳懷宇介紹了最近幾年關於景教考古的新發現。這些景教遺蹟對於理解景教在中亞乃至於中國的歷史都有巨大意義。他特別介紹了英國學者對阿布達比的景教寺院遺址的調查結果，以及德國學者對吉爾吉斯斯坦景教遺蹟發現所作調查結果。

四川大學歷史系教授陳廷湘的論文是“抗戰時期基督教會在中國西南民族地區興辦教育研究”。該時期教會興辦的教育事業屬於教會慈善事業的一部分，學校不正式設神學課，基本上是按文化教育與生產教育相結合的需要施教，思想教育方面主要是抗日救亡的受國思想教育。

中國人民大學清史所黃興濤教授的發言題目為“從‘僧袍’到‘儒服’：天主教在華傳教最早的文本見證——《天主實錄》和《天主實義》之比較研究”。通過比較《天主實錄》和《天主實義》以及後來出現的《天主聖教實錄》，可以更加清楚地揭示天主教在華傳播初期階段由“僧”到“儒”的轉變過程、實在特徵及其彼此之間的微妙關係，矯正一些有關的想當然的簡單說法 and 偏頗觀點。

四川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王炎的發言題為“聖教入川蒙難記——見證與反思”。他介紹了明末清初利類思和安文思兩位神甫入川傳播福音，被張獻忠俘獲，在農民起義軍中居留三年的故事。兩位神甫播下“愛”的種子，最終有了果子，張獻忠失敗後，許多外逃的信徒返川，教會活動也逐漸興起，而農民起義軍卻再也不見興起。

美國洛杉磯《山行文化報》記者曾慶華在《從基督教在臺灣宣教的過程來思考中國基督教未來的福音工作》中，分析了基督教在臺灣宣教的特點，認為基督教要救國必須首先地方化，基督徒必須首先成為一名小基督，把握

好雙重的委身，使基督教成為中國人自己的宗教。

基督教與思想

除了以上主題比較集中的論文外，還有一些學者的發言可以被歸納為基督教與思想。武漢大學哲學系教授孫思在會上宣讀了論文“信仰與理性——評羅素《我為什麼不是基督徒》”。她認為上帝存在的邏輯證明是不可能的。但是羅素否定“上帝存在”的論證同樣也不能成立。“上帝存在”的信仰是基於“宗教經驗”而不是理性論證。宗教與科學同是人類生活不可或缺的兩個方面，科學的發展永遠代替不了宗教對人們精神世界的終極關懷，而且宗教往往給科學注入發展的動力。

旅居芝加哥的自由作家范學德對“驕傲”作了基督教的詮釋。他指出驕傲是具有宗教性意義的詞：人想要像神。驕傲有四種形態：無所不能的支配欲，無所不知的知識欲，無所不善的道德驕傲以及無所不是的靈性上的驕傲。他引用斯賓諾莎的分析，認為驕傲是無知，因其無自知之明，同時驕傲又是軟弱，因驕傲的人沒有勇氣去面對一個真實的自我和現實的世界。

加州聯合神學研究院博士候選人李合祖介紹了“漢斯孔著作簡介以及他近年來提倡的世界倫理之理念”。他認為天主教同意馬丁路得的“因信稱義”，天主教相信人得救是靠著信，但也必須結出善工的果實，信心與行為彼此並不衝突。他也贊同漢斯孔的觀點：整個人類要努力達成一個全球人人都同意遵守的倫理規則，有了宗教間的和平才會世界的和平。

美國洛杉磯《山行文化報》記者朱易的發言回顧了美國的基督徒權利運動，該運動在表面上是宗教性質，本質上是以基督教的某些價值觀念為號召的政治運動，它成功地把基督教的價值觀和某些神學概念與美國的民主機制結合在一起，將基督徒權利的訴求直達國會並使之成為法律。由此可看到宗教與社會的密切關係。

會議期間，與會者還參觀了紐約地區四座獨具特色的中西教堂建築，對美國的基督教文化產生了深刻的印象。經過四天的研討，學者們不僅在學術上收穫頗豐，而且彼此間也建立起了學術友誼，大家相約2005年6月在加州聖荷西市再見。

